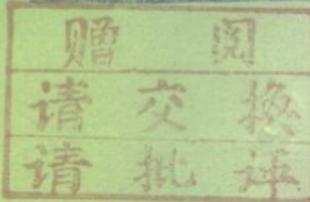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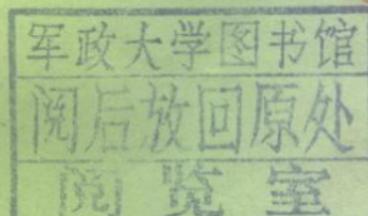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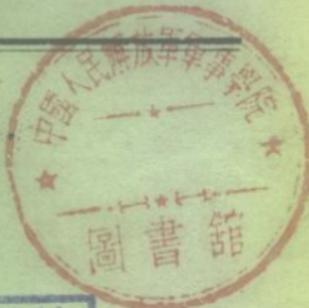


2 026 3332 9

“四人帮”反革命罪行 材料辑录

1976.10—1977.4.

(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

1977.5.

目 录

- 五、反对和破坏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反军
乱军，妄图毁我长城
- (一)反对和破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妄图以帮
代党、篡夺军队的领导权…………… (375)
 - (二)敌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妄图打倒一大
批军队领导干部…………… (391)
 - (三)煽动资产阶级派性，分裂军队，破坏军民关
系，阴谋改变我军性质…………… (405)
 - (四)攻击我军的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反对继承
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 (413)
 - (五)破坏毛主席关于军队要整顿、要严格训练严
格要求、要稳定的指示的落实…………… (418)
 - (六)伪造毛主席指示，破坏民兵建设，妄图建立
“四人帮”指挥的“第二武装”，代替解放
军和其它专政机器…………… (419)
- 六、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破坏实现四个现代化
的战略部署，反对大庆、大寨红旗，扼杀“工业
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
- (一)反对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
针，诬蔑四个现代化是“西方化”…………… (434)
 - (二)反对“鞍钢宪法”，大反大砍大庆红旗，扼
杀“工业学大庆”运动…………… (437)
 - (三)诬蔑大寨执行修正主义指示，妄图砍倒大寨

红旗，扼杀“农业学大寨”运动	(446)
(四)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鼓吹资本主义自由化，肆意破坏党的经济政策	(469)
(五)鼓吹“儒家生产、法家造反”的谬论，煽动罢工、停产、阴谋搞垮我国国民经济	(472)
(六)不顾人民死活，破坏抗震救灾	(518)
(七)破坏党的外贸政策	(523)
七、“四人帮”是破坏教育革命、卫生革命、科技战线革命、体育革命的罪魁祸首	
(一)破坏党的教育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542)
(二)反对党的科技工作路线，破坏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565)
(三)篡改党的卫生工作路线，破坏卫生事业的发展	(585)
(四)披着“体育革命”外衣，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导地位，破坏体育事业的发展	(589)
八、“四人帮”反党集团全面背叛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	
(一)背叛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为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601)
(二)背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扼杀社会主义鲜花	(627)
(三)背叛“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666)

(四)背叛无产阶级文艺传统贩卖封资修黑货…… (675)

(五)大搞“一帮独霸”实行文化专制主义……… (689)

九、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恶历史

(一)特务分子张春桥…………… (711)

(二)叛徒江 青…………… (722)

(三)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 (733)

(四)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 (739)

十、腐朽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一)张春桥…………… (750)

(二)江 青…………… (750)

(三)姚文元…………… (773)

(四)王洪文…………… (774)

五、反对和破坏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反军乱军，妄图毁我长城

(一) 反对和破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妄图以帮代党，篡夺军队的领导权

“四人帮”不止一次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光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王洪文讲“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攻击“军队不可靠，军队最危险。”张春桥最担心的就是“假如军队把枪口掉过来，那怎么办？”姚文元还有一个反动谬论，说“军队就是保守派的后台”。

《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5日

《上海已成为埋葬“四人帮”的汪洋大海》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深感人民解放军是他们篡党夺权的主要障碍，扬言军队是“老家伙治军”“军队最难办”“军队最危险”。借“批孔”为名，“要整一整军队”。

《福建日报》1976年12月8日

《不准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

“四人帮”还通过《答卷》作者的嘴，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胡说什么：“一旦风云变幻时候，不知道它要跟那个阶级走，不知道它的枪口对着谁？”他还耸人听闻地说：咱们省“似乎是解放区”，“如果风云变幻的话，咱们

这个省有可能成为根据地，或者是大本营，或者是井冈山。”

《辽宁日报》1976年12月2日

《从一个凶恶打手看“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

“四人帮”大叫“要揪军内纳吉”，（“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也叫嚷“军队里也有……的社会基础，而且还很雄厚”。

《辽宁日报》1976年11月28日

《奋起千钧棒，痛打“落水狗”》

那个传播江青“三·五讲话”而颇受“四人帮”赏识的政治小丑，秉承“四人帮”的旨意，又一次跳出来充当急先锋。

喋喋不休地叫嚷写“军内资产阶级”，“戴红领章、红五星的走资派”，说什么写好“同军内走资派的斗争”的任务已“历史地落到我们肩上了”，等等。狂吠：军内“确实有几个走资派在那里摆着，都是大家伙”；这是“你死我活的、尖锐的斗争”，“不冒点风险也是不可能的”。

《解放军报》1977年1月22日

《反革命的老调新唱》

他们声嘶力竭地狂吠“军队最危险”、“军队最难办”、“就是要整一整军队”。他们为了“整军队”，接连刮起“揪军内一小撮”、“反走后门”、“抓戴领章帽徽的走资派”等种种妖风，抛出反经验主义为“纲”的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反动纲领。

《天津日报》1977年2月5日

《掀起揭批“四人帮”反党乱军和破坏军事科研罪行的怒潮》

江青常常唱旧京剧中的“只恨我手中没有杀人的刀”这一句，这充分暴露了她朝思暮想篡夺兵权的狼子野心。江青在军队根本就没有职务，为了钻到军队里来，她不但多次叨唠什么“我进城后一直要求保留我的军籍”，“我觉得自己现在也还是军队的”，假惺惺地表示对人民解放军很有“感情”。她还采取接见、写信、派人“慰问”、送材料等手段，企图笼络军心。在她拉不动军队时，又恶狠狠地说：“要整整军队”，训斥军队干部没有向她“请示”、“汇报”、“跟的不紧”，妄图压垮军队，毁我长城。

《解放军报》1976年11月21日

《剥“四人帮”的骗人画皮，看“四人帮”的丑恶嘴脸》

“四人帮”为了他们的“整”军队，大路不走走小路。他们派出一些所谓“记者”、“联络员”专门监视部队的活动，探听上上下下的动静，搜索我军的“黑暗面”。他们派到军队中的这些人，不准各级党委过问，只同他们单线联系，并声言：谁妨碍了这些人的工作，“谁就是反革命”。这分明是搞反马克思主义的阴谋诡计。

《解放军报》1976年11月28日

《妄图毁我长城是永远办不到的》

（江青）把她的亲信找去面授机宜说：“我这个人爱放炮，但是没有炮弹，现在就把你当炮弹放出去”，“去放

几把火”，“你要把调查材料早点送上来”。这个家伙窜到空军领导机关和某师，煽阴风，点鬼火，到处搜集“材料”，公然散布“这次运动就是要搞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叫嚣：“抛开党委，一竿子插到底”。“要大胆提走后门的问题”。对这个亲信的活动，江青得意忘形地说：“炮队回来了，林彪有舰队，我有炮队。”

《解放军报》1977年1月25日

《彻底清算“四人帮”破坏空军建设的罪行》

早在批林整风运动中，王洪文、张春桥就要搞乱二炮。对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二炮领导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敬爱的周总理发现这一情况后作了重要指示，而王洪文却蛮横地叫嚷：“总理的指示，我看可以不传达。”把抵制他们错误的人说成“思想意识不健康”，“歪风邪气”，“没有党性。”

一九七五年夏，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给二炮任命了新的领导班子，打乱了“四人帮”企图控制二炮的阴谋。王洪文对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采取的加强二炮领导的措施极为不满，到处煽阴风，甚至狂叫“我要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去年夏天，张春桥收到一封关于二炮干部配备问题的信，立即指令总政派人调查。后来，总政的同志如实地写出了调查报告，张春桥见这个材料不能当作整二炮党委的炮弹，大发雷霆，诬蔑总政调查组是“保护大官们的利益”，打了总政一个闷棍。

《解放军报》1977年1月22日

《二炮怒火燃齐轰“四人帮”》

他们(王洪文、张春桥)打着“军队必须接受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的幌子，煽动警备区部队不要接受军事系统的党委领导，而一味强调接受“地方党委”他们一帮的领导。

张春桥曾多次派亲信到警备区部队活动，对连队干部战士说：“你们将来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打电话、写信给我。”

王洪文背着警备区各级党委，到部队搞“调查”，(在批林批孔时)放出：“批林批孔，上海要稳，警备区要乱”的空气。

《文汇报》1976年11月30日

《无产阶级专政的钢铁长城坚不可摧》

“四人帮”以服从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为借口，竭力破坏军事系统的领导，狂叫要“打烂军事一条线”，为此，他们采取了种种卑劣的手段。

其一、造谣诬蔑，破坏军事领导机关的威信。什么“几个总部多次运动盖子没有揭开”、“修正主义路线没有变”啦，什么“政治谣言都是从军委扩大会议以后传出来的”，“现在军队的报纸、文化的领导权，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掌握在混进部队的、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的手里”啦，什么“南京部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某地区保守势力的“总后台”，复辟势力的“总根子”啦，等等，等等。

其二、到处插手，破坏军事系统的垂直领导。“四人帮”采取反革命的“高压政策”，不准警备区向上级军事领导机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四人帮”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秉承其主子的旨意，不按中央规定，擅自指示我们警备区提前扩大传达中央文件的范围。上海警备区就是一边执行，一边向上级军事领导机关汇报也不行，竟被蛮横地加上所谓“不接

受市委一元化领导”的罪名。我们机关编印了一个《上海民兵工作情况》，不定期地向上级军事领导机关和有关方面汇报民兵工作，他们就给我们扣上“搞多中心”的大帽子。

“四人帮”在上海搞人武部、民兵指挥部“两部合并”的所谓试点，警备区党委认为这涉及到军队体制和人武部干部的工作安排，决定向上级军事领导机关报告。王洪文作贼心虚，连忙出来阻挡，叫嚷“这个问题暂不报”。与此同时，他们却加紧推广“试点”的黑经验，妄图全部并吞人武部，篡夺民兵的领导权和指挥权。

其三、大搞分裂，破坏军队党委的统一领导。王洪文、张春桥，利用其在警备区窃取的职务，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在党委内部排队划线……。打击陷害党委领导同志。

《解放日报》1977年1月19日

《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 粉碎“帝指挥枪”的阴谋》

一九七四年，在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三箭齐发，另搞一套。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搏斗的时刻，“四人帮”中的反革命文痞姚文元接到一封栽赃温州地区永嘉县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县人武部部长所谓支持上演海瑞戏的诬告信，便居心险恶地作了如下黑批示：“批判《海瑞罢官》不过八年多，居然这样明目张胆地大演海瑞戏，而且是在县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支持下出笼”，并责成省委“发动群众严肃处理此事”等等。江青、王洪文也一拥而上，纷纷挥动黑笔批示“完全同意”姚文元的“意见”。就这样，“四人帮”通过这一黑批示，又一次把黑手

伸进浙江。

新生的反革命分子翁森鹤，秉承“四人帮”的旨意，以省委名义召开电话会议，向全省大肆兜售这个黑批示。紧接着，对县人武部长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一系列迫害活动。一是定罪、二是批斗、三是毒打、四是撤职，对这样一个部队领导干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罪恶行经，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墨写的谎言毕竟掩盖不了铁的事实。永嘉县当时有些地方确实在演黑戏，包括大演海瑞戏。这是谁的罪过呢？追根究源，这只能追到“四人帮”的头上。正是这帮害人虫肆意破坏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战略部署，转移了斗争大方向；正是他们插手浙江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加剧了群众之间的对立情绪；正是他们依靠那些危害社会秩序的坏分子，煽动派性，挑动武斗，制造分裂，搞得局部地区不得安宁、资本主义势力乘机泛滥。一些地下黑剧团，大演《海瑞斗张天佑》、《狸猫换太子》等黑戏。这完全是“四人帮”一手造成的，他们才是地地道道的支持黑戏出笼的总后台！“四人帮”把永嘉演黑戏的罪过加到县人武部头上是为了借这把刀来整人、杀人，置部队领导同志于死地而后快。更重要的是“四人帮”这番大动干戈，矛头所向绝非是一个县的人武部长。他们旨在反军乱军，打倒我军各级领导同志，以便他们篡党夺权。

《浙江日报》1977年2月1日

《借刀杀人的卑劣一着》

一九七四年“四人帮”在浙江召开的省“三全会”，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重要步骤，是他们反党乱军的一

个大阴谋。

“三全会”一开场，“四人帮”就凶相毕露地杀向军队。四月七日王洪文打电话给“三全会”，有意将省军区一位主要领导同志的“同志”二字去掉。“四人帮”的那个亲信和翁森鹤、贺贤春心领神会：这下好了，“王×××亲自定性了，现在是敌我矛盾了”。于是把这位主要领导同志定为“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九、十次路线斗争的漏网分子”，污蔑他“是混入解放军内部的阶级敌人”，是“修正主义分子”，擅自撤他的职，长期将他隔离审查，并公开在全省点名批判。还把正在受审查的那些与林彪反党集团有牵连、有严重问题的人收罗起来揭发他的所谓问题，非法由这些人组成专案组，白天、黑夜对他进行轮番批斗、惨无人道地搞人身折磨，使尽了法西斯手段。

他们在大会小会，各种场合，点名批判各级军队干部。他们以交待问题为名，大搞突然袭击，深更半夜把省的军队干部叫到“三全会”上去交待问题。他们还亲自窜到部队领导机关，私自查看干部档案，查看党委会议记录，翻阅作战预案和战备值班记录，私整黑材料。现已查获：仅在翁森鹤的黑据点里，就有几百份整省军区的黑材料。

他们要整军队，是为了夺军权，翁森鹤曾凶相毕露地说：“我们要把他们一棍子打昏，等他们还没有醒过来之前，就把权拿到手。”

为了把省军区大权抓到手，还要省军区各级党委成立批林批孔小组，这个“双批”小组，在“四人帮”在浙江的那个亲信和新生反革命分子翁森鹤、贺贤春的直接控制下，成了凌驾在各级党委之上的特权机构。他们可以任意推翻党委

的决定；党委的会议，要有他们参加，否则就是黑会，党委的文件，要由他们审定，否则就是黑文件；党委的大事要由他们决定，否则就是背着他们搞阴谋诡计。他们严重地破坏了党的领导，严重地破坏了部队建设。

“四人帮”策划“三全会”整军队，不单是为了整垮一个省军区，“三全会”刚拉开黑幕，“四人帮”就下指令，要揭开省军区“军队上级领导的问题。”这个上级领导就是南京部队。王洪文亲自打电话给“三全会”，恶毒污蔑南京部队“想搞三省压上海，搞独立王国。”胡说什么浙江“一条路线从北京来，一条路线从南京来，南京是一个司令部，浙江就是要搞清两个司令部”，“这是要害，是‘三全会’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张春桥也说：“浙江问题，根子在南京。”“我们有些事不能当事先诸葛亮，但可当事后的诸葛亮，这话有现实意义，回过头去想一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浙江要想得远一点，深一点，复杂一点”，疯狂地煽动浙江反南京部队。江青也叫嚷说：省军区的后面有“师傅”，还有“师傅的师傅。”主子一下令，“四人帮”在浙江的那个亲信和新生反革命分子翁森鹤、贺贤春立即在会上叫嚣：

“解决南京部队的问题，是解决浙江问题的要害，是‘三全会’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他们大会哄，小会斗，一个劲地逼着省军区交出“老师傅”、“黑后台”，并且要省军区与南京部队划清界限，脱离关系。他们组织了庞大的黑班子，整理了南京部队的大量黑材料，给南京部队负责同志戴上了“大军阀”、“大土匪”、林彪“死党”的大帽子。他们一面派专人把捏造的材料直送“四人帮”，一面派人到南京部队机关去张贴。他们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反革命政治目的，

竟然不择手段地搜身、抄家、围攻、威逼省军区领导同志交出到南京部队开会时记录的笔记本。王洪文、张春桥又亲自出马，硬要把林彪反党集团背着南京部队阴谋策划召开的黑会，栽赃给南京部队；而把南京部队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召开的战备会议污蔑成林彪反党集团策划召开的黑会，妄图把南京部队打成林彪反党集团。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们把毒箭公然射向敬爱的周总理，整周总理的黑材料，逼着省军区一位领导同志讲出周总理的一次谈话，没有得逞，狂妄叫嚣：“不管是南京的、不管是北京的、不管什么庞然大物，都要揪，要揪出师傅的师傅。”

“四人帮”为了搞垮军队，一面在会上攻，一面把“三全会”反党乱军的祸水引向全省各地、引向连队基层，进行内外夹攻。

四月七日，王洪文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打电话要那个亲信和翁森鹤他们继续揭批“军队上级领导”的问题，四月八日他们就召开了全省十万余人的大会，点了省军区领导同志和南京部队负责同志的名。于是全省立即掀起了一股巨大的反党乱军恶浪。几天内，各地、市、县“三全会”纷纷开场，层层揭军分区、人武部的所谓阶级斗争“盖子”，层层揪所谓“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从省军区领导，到军分区、警备区、人武部、公社武装部领导，基层民兵连长都被打成了“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有的县“三全会”整理了人武部领导同志的所谓罪行材料，发动全县组织批判。

这帮家伙整了军队领导机关还不算，还要亲自到连队去放火。“三全会”期间，“四人帮”在浙江的那个亲信和翁森鹤等人多次窜到部队，大作反党乱军的黑报告。他们在军

队没有任何职务，却蛮横地干涉部队工作，公开在大会上点名辱骂军队领导，别有用心地煽动部队说：“你们的上司搞修正主义了，怎么办？”“服从也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地服从。”胡说干部战士的关系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这帮家伙唯恐部队不乱，还要强行将他们的反党乱军黑报告录音复制发往各部队播放，蓄意在部队制造混乱。他们嫌乱得不够，还整理了十万多字的所谓省军区领导同志《罪行一百例》广泛印发到连队，作为“反面教材”进行所谓“路线教育”。他们到部队又是接见、又是慰问、又是座谈，一个劲地煽动机关、部队干部战士上访，到省军区机关搞串连、贴大字报。

乱军是为了篡党夺权。他们炸省军区没炸开，烧省军区没烧乱，就公开拉起了“第二武装”，扬言：“省军区靠不住了，要防止军队政变”。翁森鹤露骨地叫嚣“搞民兵，我们可以告诉你们，就是为了夺军权，对付省军区叛乱。”他们拉起“第二武装”到处抢武器，挑动武斗；私立公堂，私设监狱；任意打人、抓人、杀人。他们还闯进监狱，将民愤极大的罪犯放出来，充当打手。他们冲击军事机关，进驻军队领导同志的住宅，占领部队招待所，围攻、辱骂军队领导干部，对干部实行断粮断水，堵截交通要道，向部队营区放枪、任意扣留、关押、游斗、殴打干部战士，真是无恶不作。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刻揭露了“四人帮”的阴谋，“三全会”不得不草草收场，但是，他们不甘心失败，在王洪文提意下，“三全会”写了两个假报告，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恶毒攻击、陷害省军区和南京部队领导同志，还狂妄地要挟中央，“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有

关会议，解决南京部队的问题”。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省军区领导同志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四人帮”在浙江的那个亲信和新生反革命分子翁森鹤、贺贤春立即策划一些人围攻省军区、又给省军区戴上“思想还潮；……”的帽子，整理了黑材料，专程送给“四人帮”，“四人帮”恼羞成怒，把省军区领导同志叫到北京，又压又打，当面训斥。王洪文叫喊说：“你们对‘三全会’和反潮流的同志看法不一致，这股风不刹不得了。”一顿训斥之后，便勒令他们“要总结经验教训”，“要转屁股”。说什么“你们省军区的屁股动一动好不好，哪怕稍微动一点也好嘛。”省军区广大指战员没有动，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王洪文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九七五年四月，他又给省军区领导同志下达黑指示：“有问题解决不了直接报告中央。”就是要他们直接报告“四人帮”，妄图把省军区直接控制在“四人帮”手里。

毛主席亲自圈阅批准了中央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文件，给了“四人帮”当头一棒。可是，“四人帮”贼心不死，百般仇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王洪文又亲自窜到浙江，以召开座谈会为名，对他的爪牙说，你们要潜下来，连头发也不能露出来，妄图伺机东山再起，但这只能是痴心妄想。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三全会”连同他们一起，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浙江日报》1977年2月9日

《一场触目惊心的反党乱军大表演》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张永生对温州地区上访人员说：“现在军内有一个全国性的反革命组织，比林彪还凶恶毒辣，是人

武部这条线的，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那些人。”

《浙江日报》1977年3月11日

《野心勃勃，穷凶极恶》

一九六八年张春桥在上海多次秘密召见张永生，……给他许多有关南京部队主要负责同志的黑材料……授意张永生大反南京部队领导。

《浙江日报》1977年3月11日

《野心勃勃，穷凶极恶》

在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四人帮”背着毛主席、中央政治局，私自派人到我军各大单位，搜集、整理部队大量黑材料，以便为他们整军队提供炮弹。在他们的指使下，有的人没有军籍却在济南部队东跑西窜、点火、放炮、搞情报、告黑状。

《大众日报》1977年1月13日

《愤怒揭批“四人帮”反军乱军的滔天罪行》

张春桥、姚文元打着“解决山东问题”的幌子，于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窜来济南。

张姚窜到济南以后，在军队的一次会议上，张春桥一口咬定：部队支持了“保守派”夺权，大方向错了。他蛮横无理地说：昨夜我乘车看了一下济南市容，街上贴了一些拥军大标语，凭政治经验，这类标语是“保守派”贴的。姚文元也阴阳怪气地说：部队支左错了，“让他们一下子转不容易”。

张姚为了乱军反党，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挑拨离间，制造对立。在一次会议上，说：我是从心里热爱解放军的。